

兰州市安宁区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行为空间选择调查

王 瑛, 杨 清, 安琦丽, 张鹏鹏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以城乡边缘区为地理单元,以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就业空间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对兰州市安宁区 4 个村 220 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失地农户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就业行为选择和目前影响失地农户就业行为空间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就安宁区来说,农户家庭因为征地而获得的补偿收入相对较少,安置小区的基础服务设施水平相对较低,而使安置小区一部分农户家庭对征地政策略有微词。征地前以土地为生的农户,在征地后更倾向于在市区发展。就影响就业行为的主导因素来说,收入一直是最重要的。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交通、教育以及医疗等基础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都对就业行为空间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城乡边缘区;失地农户;就业行为空间选择;安宁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1463(2018)01-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1-1463.2018.01.016

城乡边缘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在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等方面与城市和乡村有显著区别,城乡边缘区居民就业往往面对的是“务农无地,务工无岗”的困境。在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尽管农户的身份由农民转为市民,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失去了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户经常面临家庭支出压力^[1]。探讨有关安宁区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行为空间选择的问题,可对安宁区农户的背景、务工空间、自主发展能力、农户就业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以此反映甘肃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问题,为其他地区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问题提供参考方案。

1 调查区域及方法

从 20 世纪末兰州市提出建立副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以来,安宁区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虽然有安置小区解决失地农户居住问题,从农民变为居民,但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到 2015 年已有 64% 的村成为“城中村”,因部分土地已被征用,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部分农民失地后,就业成了问题。城乡犬牙交错,农民、居民混居,一城两制、一家两制,两种身份,不同待遇。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干部群众之间因征地费用的使用、集体资产的管理等问题

而产生的矛盾也很突出。各种利益诉求不同的人群,得不到妥善的协调和安排,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产生。边缘区农户年轻时因缺乏专业技能倾向本村镇就业,少部分人选择市区及外地就业。随着年龄增大,农户更加重视家庭因素,原选择市区和外地就业的农户逐渐回到本村镇^[2]。收入和家庭是农户就业空间演变的主导因素,有无职业技能制约农户就业地域的选择,市区的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对农户具有较大吸引力。农户对就业地域空间的选择具有明显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无技能”等个人属性方面的差异。

我们以城乡边缘区为地理单元,以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就业空间行为角度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选取安宁区城乡边缘农户家庭为调查对象。主要涉及调查的村镇有兰州市安宁区桃林村、刘家堡街道刘家堡安置小区、银滩路街道银滩路安置小区以及银滩路街道沙井驿小区。以发放调查问卷为主,并结合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实地调研。于 2016 年 6 月在调查区域内共发放问卷 220 份,其中,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 200 份,其余 12 份问卷未收回,8 份有毁损,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90.9%。

分析数据主要来自入户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数

收稿日期: 2017-05-11; 修订日期: 2017-11-23

基金项目: 甘肃农业大学 2016 年度学生科研训练项目(20160610)资助。

作者简介: 王 瑛(1994—),女,甘肃武威人,学习专业为农林经济管理。E-mail: 1398290538@qq.com。

通信作者: 杨 清(1980—),女,甘肃武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E-mail: 252583353@qq.com。

据。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随机抽样调查,主体形式是问卷,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4个部分:(1)农户的基本属性,包括了各年龄段、各学历层次和各阶层的人群,基本可以代表兰州市安宁区农户就业的整体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农户生产就业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情况;(3)农户就业条件调查,主要包括农户自身条件和外部条件;(4)农户意愿调查,包括农户外出务工意愿、就业空间意愿等。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1.1 年龄分布 2016年7月对调查所得的200份有效问卷进行整理。如图1所示,本次调查总人数200人,男114人,女86人,男女比例57:43,其中18岁以下人群、18~30岁人群、31~40岁人群、41~50岁人群、51~60岁人群、60岁以上人群占调查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5%、19.0%、19.0%、16.0%、18.5%、26.0%,可以看出,60岁以上人群的比例最高,18岁以下人群比例最低。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解当时征地政策所占比例最大的是60岁以上人群,享而受征地后的政策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是除60岁以上人群的其他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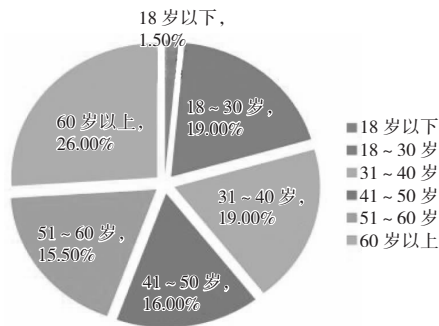


图1 调查人群的年龄分布

2.1.2 文化程度及性别分布 如图2所示,在调查涉及的兰州市安宁区200户农民家庭成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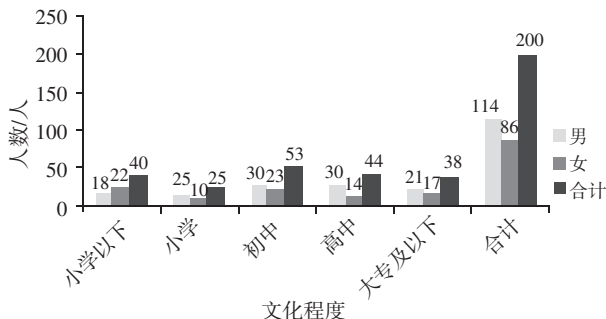


图2 调查人群的文化程度及性别分布

小学以下、初中程度、高中程度的较多,分别为20.0%、26.5%、22.0%,总体上教育水平较低,且男性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女性。

2.1.3 年收入及性别分布 调查对象的收入情况及性别分布如图3所示。对200户农民家庭成员年收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年收入10000~30000元所占比例最高,占40.0%;其次为30000~50000元,所占比例为21.5%;高于50000元与低于5000元的比例最小,均为9.5%。经分析,收入最少的还是60岁以上的老人,除养老金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收入。从年收入的性别分布看,男性普遍高于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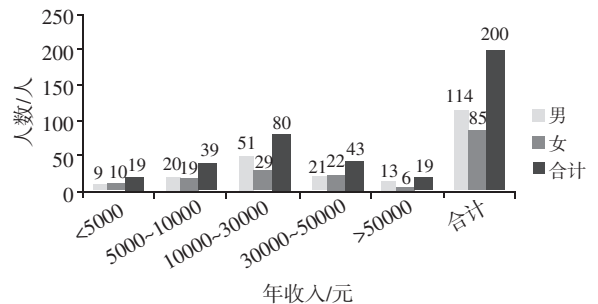


图3 调查人群的年收入及性别分布

2.1.4 工作类型分布 失地农户工作类型的指标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以临时工居多,占50.0%,这是由于多数失地农户文化水平不高,与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不匹配,就业机会不多,多选择做临时工^[3]。家庭被征地后,当时大多数家庭中的男性选择外出务工,女性一般会留在家中照看孩子以及老人^[4],这也说明了外出务工的男性人数居多、女性人数偏少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农户就业空间距离摩擦会越来越小^[5]。

表1 调查人群的工作类型及性别分布

调查人群	工作类型				合计
	文员/人	技工/人	临时工/人	无人/人	
男	21	25	52	16	114
女	15	16	48	7	86
所占比例/%	18.0	20.5	50.0	11.5	100.0

2.1.5 户口性质分布 调查对象的户口性质如图4所示。在调查时,大多农户家庭在户籍改革之前是农村户口,改革后为农转非户口。由于城乡户籍本质并未达到完全统一^[6],相对应的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基础设施服务方面仍然和城市居民有较大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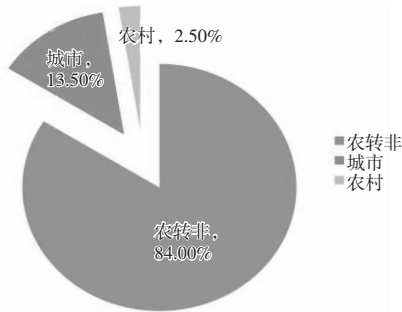


图4 调查人群的户口性质分布

2.2 就业地点分布

调查对象过去的工作地点分布如图5所示，现在的工作地点分布如图6所示。过去本村镇中工作的农户比例为50.5%，现在的比例为42.0%，数据对比得知，有8.5%的农户转至市区或外地工作。相对本村镇，市区基础社会服务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比较完善^[7]，且市区收入水平高于周边村镇，能够更好的满足失地农户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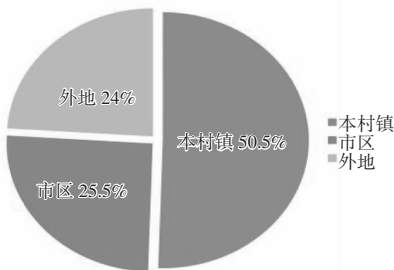


图5 调查人群过去的工作地点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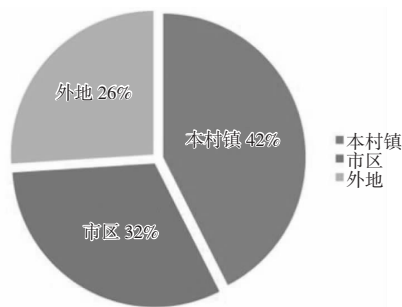


图6 调查人群现在的工作地点分布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8]，安宁区城市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第二、三产业方面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在安宁区置产定居以及工作生活的人群不断上升。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户依旧拥有土地，这部分农户目前紧跟发展休闲农业的步伐，农家乐、观光农业等的发展为当地未失地农户提供了就业渠道与方向。安宁区依托区位优势打造区域物流节点城区，实施物

流通道及多式联运、现代物流园区建设等，高标准打造物流园重点物流项目，积极发展临空产业和临铁产业；依托商贸流通辐射优势加快区域性商贸中心建设，十里店滨河餐饮、孔家崖精品购物等“八大商贸圈”建设稳步推进，为安宁区域经济转型注入新的动力。2015年，安宁区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1亿元，同比增长15%。第三产业硕果累累，如仁寿山景区农家乐提升改造项目10个院落招商运营，金牛街商业广场投入运营，中国玫瑰交易网、百合交易网等12个单品企业上线运营；成功创建仁寿山AAA级景区，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286万人（次），同比增长30%。由此产生以及带动了就业岗位增加^[13]。

2.3 影响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行为空间选择的因素

2.3.1 工作地选择的影响因素 如图7、图8所示，在影响工作地选择的因素中，收入都是主导因素，其他因素也在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在家庭生活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家庭生活质量以及子女教育水平，所以影响农户就业行为空间的主导因素中，收入占据最大比例。其次，年龄也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因素。在中国传统历史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家庭生活占较大比例^[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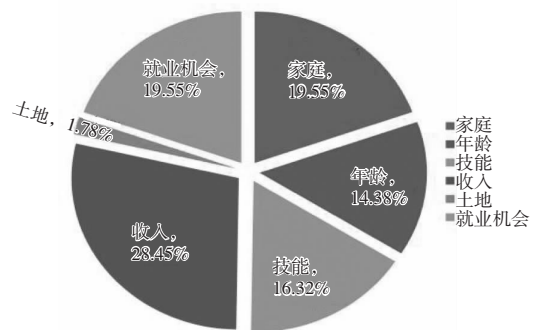


图7 调查人群当前工作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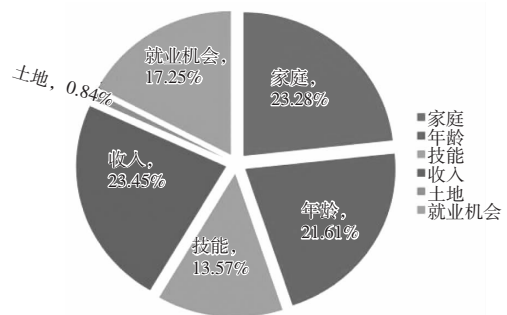


图8 调查人群将来工作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布

2.3.2 收入满意度 如图 9 所示,影响失地农户的就业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中,收入满意度在调查中选择一般的人占 47%,这反映了安宁区的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居民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说明人们对当前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质量并不是特别满意^[10]。其次,由于目前兰州市人均收入水平相较一线城市仅为一般,仅从安宁区商品房价格来看,失地农户家庭将要面临更大的购房压力;加之城乡边缘区失地农户家庭本身综合素质不高,可供选择的就业方式较少。政府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等薪金待遇较高的岗位对学历要求相对较高,但征地的农户家庭成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其他技能类的特殊岗位,由于岗位技能的特殊性,对所用之人的技能要求较高,由于农户在征地后并未接受专业的技能培训,后来者也由于接受技能培训的时间较短而专业水平并不高。所以,失地农户的技能水平并不完全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因此,由于学历水平以及专业技能水平的影响,征地后的农户面临的就业范围以及相对应的选择就较窄。同时也缺少必要的外出务工资源和生活保障,更增加了失地农户的就业难度。所以,这也直接影响了失地农户在就业时会选择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以及工作地区^[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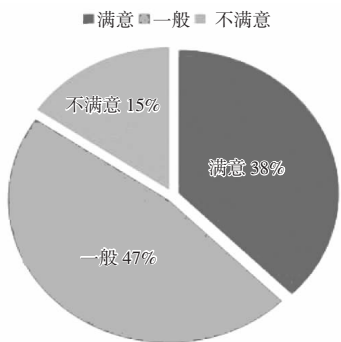


图 9 收入满意度分布

2.3.3 影响就业行为的主导因素 如图 10 所示,就业行为选择的主导因素中,最明显的仍然是收入因素,其次是交通,而政府政策和家庭比例相等^[11],更多人倾向于在市区工作。调查得知,影响现在工作选择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影响未来工作选择的主要因素还是收入,其次是家庭以及年龄。以安宁区银滩路安置小区居民来说,该小区居民在失地后被安置在银滩路安置小区,该小区距离附近的甘肃农业大学仅有 500 m,由于“大学城”建设扩张用地,周边土地不断转换为学校用

地,随着学校周边的商区建设和发展,以“大学”为依托的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的当地置业模式。城乡边缘区农户在以获得高收入为首要目的的同时,仍然要考虑交通便捷与否以及家庭情况,在选择工作时,交通的便捷状况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农户的就业选择。以刘家堡安置小区的失地农户为例,该安置小区的农户在考虑就业时,首先要考虑收入水平的高低以及交通的便捷状况,另外,由于兰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沿黄河两岸的狭长带状分布,交通状况影响上班时间的准时性以及就业后的按时到岗率,所以在安置小区周边,公交线路的多少以及用时的长短,目的地的距离,都会影响居民的就业选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城乡边缘区失地农户家庭可以选择的就业方式较少,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外出务工资源和生活保障^[12],周边村镇也逐渐建设发展起来,工作岗位也在随之增加,这部分农户往往会选择风险最小的就业模式,即选择在本市或本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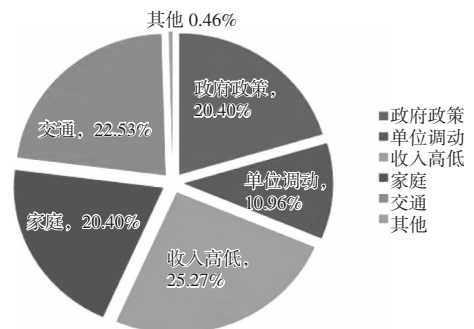


图 10 调查人群就业行为选择主导因素分布

3 思考与建议

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在土地被征用后,选择去交通便捷、基础服务设施良好的城区工作,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发现,目前农户家庭对当前的收入满意度仅仅处于一般的状态,就安宁区征地政策来说,农户家庭因为征地而获得的补偿收入相对较少,安置小区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后期的政府安置服务政策并未真正落实到农户家庭中去,而使得安置小区一部分农户家庭对征地政策略有微词。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失地农户在选择进城务工时,生活预期依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如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底层,工作性质基本

是提供体力劳动,基本的生活保障缺失,面临着诸如生活环境脏乱差、城乡歧视、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以及子女入学困难等问题,失去了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却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承担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大等等诸多问题^[13]。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安宁区安置小区交通不便以及医疗保障不完善,教育设施服务水平低等问题,此时,首先政府应不断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基础服务建设,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城乡二元制结构改革,真正的变“农民”为居民。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机制调节作用,与市场紧密结合,做好安宁区村镇的经济发展规划,充分带动安宁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更多的距离家较远的市区工作人员和外出打工人员回到安宁区发展。政府还应该做好失地农户家庭成员的就业补偿工作,以就业扶持促进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缓解失地农户家庭的经济压力,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失地农户家庭成员的住房问题,政府应加大对兰州市楼市价格的调控力度,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住房的数量,缓解居住压力。其次,失地农户自身观念必须有所改变,不可过分依赖政府。在调查过程中反映出工作地的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存在,对农户的就业行为选择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调查显示,失地农户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难以满足当前人才市场对相应岗位的要求。安宁区正处于调结构、促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新型综合型人才是重中之重^[14],新型人才是安宁区快速稳步发展的软实力,只有失地农户以及失地农户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紧紧跟上安宁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不断为安宁区发展提供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当然,失地农户也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保障与支持,更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与政府、企业紧密配合,尽快解决就业问题。最后,要让安宁区的社会企业自觉提高社会服务意识,承担社会责任。在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企业应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紧随经济市场的时代发展大流,拓展更多的就业岗位。如安宁区金牛街购物中心的成立就为安宁区提供解决了近乎1800余人(次)的就业岗位,带动周边经济增长12.5%。所以,进驻安宁区的社会企业应一方面积极开展生产经营工作,努力开拓市场,优化业务模式,依法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树立和维护诚信、守法、公正的良好形象,依法纳税,主动承担对自然环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义务,追求公司与员工、股东和社会的同步进步和发展。此时,只靠政府和失地农户的单一力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更多的是需要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协同合作。除此之外,城乡边缘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人居环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此,也要发挥独特性,利用边缘区的独特性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边缘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就业。

参考文献:

- [1] 李伯华,曹冬,杨森.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空间行为模式及机制研究—以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4个样本村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2,24(3):26-30.
- [2] 郝亚光.社会化小农:空间扩张与行为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6(4):8-12.
- [3] 李华.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支持[J].人口学刊,2003(5):53-57.
- [4] 王春超.收入波动中的中国农户就业决策—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3):48-57.
- [5] 王春超.中国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农户家庭调查的理论 with 实证[J].管理世界,2009(7):93-102.
- [6] 张林秀.经济波动中农户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0(5):7-15.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7[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 [8] 史清华,程名望.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结构与收入水平关系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9(4):39-42.
- [9] 白南生,李靖,陈晨.子女外出务工、转移收入与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6-52.
- [10] 都阳.中国贫困地区农户劳动供给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 [11] 黄平,马春华.有关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培训的相关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5(3):77-87.
- [12] 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7(3):2-15.
- [13] 梁伟.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典型模式调查[J].甘肃农业科技,2013(4):34-37.
- [14] 移天煜.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开发评价[J].甘肃农业科技,2014(2):41-45.

(本文责编:郑立龙)